

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

射雕英雄传 一

文化艺术出版社

《射雕英雄传》总论

幺书仪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的第三部武侠小说。最初在《香港商报》副刊连载，副刊编辑李沙威经手此事，那是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间的事了，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射雕英雄传》的修改本完成。一九八〇年，《金庸作品集》三十六册由香港明窗出版社一举推出，其中有包括《射雕英雄传》在内的武侠小说十五部、历史人物评传一部和历史考据一部。

一般研究者认为，二十世纪初叶至四十年代，是我国武侠小说的创作高峰期，金庸是作为与这一“高峰期”相衔接的所谓“新武侠”小说的“武林盟主”。他的武侠小说发表以后，总是不胫而走，拥有大量的读者。不过，内地和台湾正式出版他的著作，都是在他的书通过非正式渠道大量流布、他的声名在民间已如日中天之后的事情。一九七九年九月，台湾当局同意报纸连载和出版金庸的作品，而内地则在一九八五年四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方始得到金庸授权，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其时，据官方统计，单是一九八五年度，金庸武侠小说的盗版本在大陆就有四千万册。一九九四年一月，北京三联书店得到金庸的合作，在内地出版三十六册的《金庸作品集》简体字本，是为正版。至此，再加上新加坡本、马来西亚本、越语本、泰语本、缅甸语本、印尼语本，说金庸的小说是华人世界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品，大概是不成问题的了。

香港本土之外，对金庸作品认识最早、评价最高的人，要数台湾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他不仅以个人之力与台湾当局多方交涉，从而获得了金庸武侠小说在台湾的解禁，而且也获得了金庸作品从连载到出版的发行授权。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出版商，沈登恩把评价金庸作品的重心，放在阐释作品的文学价值上。他先后出版了二十几本研究专书，冠以“金学研究”的名目。嗣后，远流出版公司亦不甘人后地出版新版《金庸作品集》，同时推出《金学研究集》若干种，为致力于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化”推波助澜、不遗余力。

相比之下，内地学界对金庸的态度就要冷静得多了。这种“冷静”的原因复杂，不易条分缕析，但现象之一二三是：一九五七年以后，作为小说类型之一的武侠小说创作即已绝迹，研究则更无从谈起，香港与内地在那些年代的特殊关系，以及内地文学界对于以武侠、言情类型为主的“通俗文学”在一段时间所持的严厉批评的态度，都使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可能获得内地学界的认可。

《射雕英雄传》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般也把它看作是金庸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它在台湾出版时，曾经易名为《大漠英雄传》，其因盖与政治有关。《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的成名之作，成功之处在于，它将“历史”和“传奇”天衣无缝地融成一体，创造了一个既超脱于“真实”和“虚构”两把标尺之外，又具有“历史感”的传奇小说的模式。古龙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中，对二十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曾有这样的描述：

我们这一代的武侠小说，如果真是由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始，至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到达巅峰，至王度庐的《铁骑银瓶》和朱贞木的《七杀碑》为一变，至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又一变，到现在又有十几年了，现在无疑又已到了应该变的时候。

古龙这段话的主旨，当然是要阐明他对求“新”、求“变”的艺术境界的追求和对继金庸之后的“古龙时代”到来的宣布，但他对《射雕英雄传》在金庸创作中、也包括在武侠小说的发展史上所处特殊位置的看法，大体上应该说是允当的。因了上面的原因，《射雕英雄传》在批评者言及金庸创作时，总会与其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和封笔之作《鹿鼎记》一起，被更多地提到。

—

《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发生于宋金元易代之际的历史背景之下。在对历史的借用和对传奇故事的构想上，作者付出了许多心血，有许多创造。

大凡可以约定俗成地被称为“历史演义”和“历史剧”的小说或戏曲，多半都会碰到如何处理“史实”和“虚构”的问题。其实这是个并无成规可言的问题，元明清的戏曲家和小说家，都各有各的办法：或者为着某种观念、情绪的表现，对史实进行有利于这种表现的选择或改造；或者在少量史实依据的基础上，作大幅度的扩展与虚构；或者在史料的运用上相当“忠实”，却是以自己的情感和对“历史”的独特理解来把握这些史实，而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

《射雕英雄传》的作者所要着眼的主要并不是“历史”，而是“传奇”，他的目的，并不是为着敷演历史，归纳所谓“历史”的“发展规律”。在书中，史家意识当然不是没有，但更多的是一种“史实”为我所用的文学态度。《射雕英雄传》是借用宋金元更迭

这段历史的大框架，在中间编织他的传奇故事。严格地说，这段历史只是被作为人物行为、情感表达的“背景”，或使人物穿行于其间的“框架”。当然，这“背景”和“框架”也是很重要的，并非可有可无的布景，这是因为，作者需要为他笔下的人物，寻找一个头绪纷乱、动荡而呈现出无序状态的历史空间，一个实在的、并非“虚拟”的历史时间，好让他的人物在这个合适的时空里展现他们言行、情感的人性内容、表现他们超群拔萃的技艺、赋予他们一种重大而严肃的“历史行为”的崇高性。显然，确定宋金元对峙的这个“历史”时空，是一种合适而有效的选择。

因为《射雕英雄传》不是“历史演义”，而是武侠的“英雄传奇”，因而，对于“史实”的处理就会更具灵活性和想象性。当小说中对于宋金元三国对峙的关系和彼此力量消长的基本事实都与历史相吻合时，作者对“史实”的尊重态度是相当严肃的：南宋的腐朽、金宋之间类似主仆的关系，蒙古联宋共同伐金以及成吉思汗的家族、性格等等，大都有史实记载作为依据，并不妄加臆度；但当故事展开具体的情节和细节需要偏离历史时，他对史实的“改造”也是相当大胆的：从书中可以看到，成吉思汗凭空有了美丽的女儿华筝公主，金章宗不再是六个儿子都夭亡于两岁之前，而是添出了一个平庸的四王爷完颜洪熙和另一个有眼光、多情义、擅智谋的六王爷完颜洪烈。至于对襄阳之役的改写，就更表现了作者的传奇意绪。

史书上记录的襄阳之役，几乎是一个带有惨烈意味的事件：襄阳虽然地处南宋所恃长江天堑的咽喉要冲，然而，南宋奸相贾似道却一直以苟安“玩敌”的态度对待蒙古军对襄阳的步步进攻。从咸淳三年（一二六七）九月蒙古都元帅刘整与阿术议取襄阳开始，到咸淳九年（一二七三）二月，守将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使吕文焕降元为止，中间经过了五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蒙古军非常从容地围樊城，以孤立襄阳，筑堡鹿门山，

以断襄阳粮道，教练水军七万，营造战舰五千艘。守卫襄阳的吕文焕不断地向朝廷告急，请求“益师”增援，然而，一切都如石沉大海，贾似道向宋度宗封锁消息，对襄阳被围置之不理。到了第五个年头，吕文焕的处境已经相当凄惨，粮草不继、援兵不至，城中已到“撤屋为薪，缉关、会为衣”（《续资治通鉴》）的地步，吕文焕每次巡城都“南望恸哭而后下”，最后终于对朝廷绝望而降元。

金庸笔下的襄阳之役的重头戏是在他另一部小说《神雕侠侣》中，《射雕英雄传》只是在结尾的第四十回写了一个开头，但即使是这个开头，对于襄阳之役的修改也已是使“史实”面目全非：首先，襄阳之战由忽必烈时代改到成吉思汗时代，提前了四十年。其次，南宋守将由吕文焕变成了吕文德。第三，由郭靖和黄蓉假传圣旨代替吕文德迎战蒙古军。第四，攻打襄阳的蒙古将帅是拖雷。

这些对于历史“史实”的改变，使“襄阳之役”在故事中完全消失了它的历史概念，变成了一个南宋和蒙古交兵的历史场景，一个使郭靖和情同手足的异族兄弟拖雷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契机，一个可以让郭靖表现其有别于成吉思汗的、“为国为民”舍身取义、“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的英雄行为的舞台。隐去了吕文焕的名字，或许还包含了作者对那位为昏庸的南宋朝廷竭忠尽智之后，终于还不免作了“贰臣”的将领的同情——他不能让吕文焕在小说里继续承担莫须有的罪名……总而言之，在《射雕英雄传》里，历史服务于传奇、服从于故事的作法，到此发挥到了极至。

事实上，这作为故事结尾的襄阳之役，不仅使郭靖的胸襟、抱负和行止，远远地超过了江湖夺宝的胜者、除暴安良的侠士、好勇斗狠的武师、寻仇报恩的豪杰，而且使他在与历史上毫无异议的“英雄”成吉思汗的对比中，成为一个如日中天的大侠——

一个作者塑造的、闪烁着理想光辉的“大英雄”。

这个结尾与传统戏曲、小说的“大团圆”结尾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它既满足了读者对于英雄的期待，又避免了一般大团圆结尾由千篇一律带来的乏味和由强弩之末带来的无力，还捎带对读者由于历史耻辱造成的精神创伤进行了梦幻式的（或说是阿Q式的）治疗。

这种“改写”，在历史家看来，是要皱眉头的，因为“史实”是治史者最基本的依据和出发点。但金庸并非“史家”，他也不是要你在《射雕英雄传》中去认识“历史”，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讲故事”，因而，这种处理，自有他作为小说家的理由。

不过，金庸面对“史实”的压力，有时也表现出一种“胆怯”，他特地在小说的后面，作了两个“附录”，告诉读者，历史上的“成吉思汗家族”和“全真教”是怎样的，或许是期望在读者的心中产生一种类似布莱希特戏剧理论中所说的“间离效果”吧！他还曾经表示，他很羡慕西方拉丁语系中，“历史”与“故事”是一个字。然而，这在中国可没那么幸运，中国有立“正史”的传统，改朝换代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修前朝的历史。金庸毕竟有他独特的历史观。或许在他看来，“历史”也是一种“叙事”，它与文学的“叙事”之间的“界限”，在中国可能是被过分地夸大了。事实上，中国传统小说、戏曲中的历史题材创作，也表现了作家比较大的想象、构造的空间，从这点而言，金庸也是有所继承，而并非完全是“新变”的。

二

金庸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中自言：

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

的“说书先生”)。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做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也有金钱上的报酬)。……

我以为小说主要是刻画一些人物,讲一个故事,描写某种环境和气氛。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戏、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分辨是非。

这段话刊载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出版的台湾《纯文学》(香港版)杂志第五卷第四期上。当月二十四日,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便开始在《明报》上连载,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看作金庸对自己创作思想的总结性的说明。事实上,类似的意见,金庸后来也曾曾在访谈、对话中多次述及。这个时候,金庸在武侠小说的写作上已经大获成功,但他对这些作品仍能保持一种平常的、坦诚的姿态,这倒是让人有契于心。他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于“娱乐性的”、“普及大众的文字形式”(王力行《新潮文学一户牖》)的类型上,当不是故做谦虚之态,而应理解为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金庸的小说的价值,已有被批评界广泛重视和认可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讨论金庸包括《射雕英雄传》在内的小说的创造性时,似乎也不必刻意要离开它们所属的“类型”,以为将他的作品放置在超越武侠的通俗小说的类

型上，就能提升其思想文学价值。事实上，它们的成就应放在原来的范畴中来加以考虑。

《射雕英雄传》自然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武侠小说的链条上的一节，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突破性质的环节。小说中情节和人物的基本设计，自然有对于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继承，诸如争斗的内容、侠义的精神以及复仇、夺宝、除恶、比武等传统模式的运用，标示着包括《射雕英雄传》在内的金庸小说与旧武侠小说之间的血缘关系。但是，在《射雕英雄传》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属于金庸的、创造性的、个性的东西，而正是这点，使他的“新武侠”极大地超越了“旧武侠”的精神境界和艺术水准，也使他在高手如林的“新武侠”界，成为公认的“武林盟主”。这种很“现代”的、创造性的东西，也可以从金庸的“自白”中找到线索，那就是他所说的，他希望书里“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结合着《射雕英雄传》这部作品，可以把这话的意思理解为：他是要在一个讲得好听的故事中、刻画得好的个性中，自然地流露出对于美、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人性的维护，对正义的坚持，对善良之心和清平社会的向往以及面对不公平之事的同情与侠义之心的呼唤，因而，尽管金庸说艺术“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分辨是非”，但实际上，他的那些包括《射雕英雄传》在内的、并未刻意追求有“重大价值”的故事，已经在对于“真理”、“是非”等有着具体内涵的观念的发挥上，取得了自己一席特别的位置。这到底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呢？还是“是真名士自风流”呢？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

《射雕英雄传》开始写于一九五七年，当时，金庸三十三岁，而立刚过，正是在人生的路上鼓满风帆的时刻，全力以赴做事，追求成功和完美，对未来充满憧憬。这种意绪和心态，都在《射雕英雄传》中留下了痕迹，包括他对于人性的更多理想主义，却

失于老到的认识在内。

《射雕英雄传》中的人物，虽说比起《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来，显得太“单纯”了一点，但这种包含了对英雄人物的带有乌托邦式的崇敬心理和对英雄人格完美的追求在内的“单纯”，却是金庸前期武侠小说创作的心力所系。书中那属于三十岁人的、尚未老于世故的那个色彩纷呈的性情世界，会令你心折——“单纯”也有“单纯”的魅力。

《射雕英雄传》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刻画了那些“性情中人”。所谓“性情”，原指包括人的秉赋、气质在内的本性。“性情中人”多半是指不虚隐、不矫饰，依照自己的本性行事的人。简单说来，就是为人处事，秉持一个“真”字，因而也可以称为“真性情”。《射雕英雄传》中的性情中人极多，且经常成对地出现。彼此相异者，互相对照、互相映衬；彼此相近者，同中有异、异中见同。

郭靖和黄蓉便是一对相反的性格，一个纯朴坚实、浑厚率真，一个黠慧灵透、任真自然；一个讷于言语，一个思路和行为都极敏捷。两个人在一起时，互为手足，配合默契。遇见寻常事变，郭靖往往拙于应付，而由反应敏捷的黄蓉出面应对，郭靖只是依照黄蓉的指令作冲锋陷阵的前锋。但在重大事件的决策面前，黄蓉却就作不得主了，郭靖这时会有一定之规。情绪化的黄蓉心里极明白，这“一定之规”是不可以对抗的，若在大事上与观念大于情感的郭靖相左，也许会永远地失去郭靖，因此，这时她即使满肚子的不乐意，也会退在一旁，由着郭靖去决定。

黄蓉的巧慧是郭靖质朴的补充，而郭靖的大拙，又克制了黄蓉的大巧，并预防了她巧极而可能变化成为诡诈。两个人在一起时，黄蓉的风头和郭靖的厚道都极可爱，如第二十六回“新盟旧约”中，描写郭靖、黄蓉在傻姑酒店与黄药师、江南六怪相遇，黄药师原以为女儿已死，父女相见自有意外之喜，六怪与郭靖分

别日久，这中间也发生了许多事情，书中描写：

这边郭靖向师父说别来情形，那边黄药师牵着爱女之手，听她咕咕咯咯、又说又笑的讲述。六怪初时听郭靖说话，但郭靖说话迟钝，词不达意，黄蓉不唯语音清脆，言辞华赡，而描绘到惊险之处，更是有声有色，精彩百出，六怪情不自禁一个个都过去倾听。郭靖也就住口，从说话人变成了听话人。

两人自从第十一回双双离开六怪之后，遇过洪七公、去过归云庄、在宝应县救下程大小姐、师徒到桃花岛求过婚、在海上大战西毒、在岛上伤了欧阳克、到皇宫为保护《武穆遗书》与欧阳锋一伙相遇，最后去牛家村密室疗伤，可说的事的确不少，郭靖是这些事的主角，却不善言辞，说得索然无味，倒是黄蓉说得神采飞扬，出尽了风头。正是因为郭靖与黄蓉都有侠肝义胆和见义勇为的勇气，而且遇事一智一勇互为表里，所以黄蓉的风头才不显得浅薄，郭靖“从说话人变成了听话人”也才不会变成傻呆。

郭靖与黄蓉又是一对互相依赖的性格，他们俩只有放在一起，才是没有欠缺的完美。第二十一回写黄蓉与受伤的洪七公飘到小岛上，旁边还跟着一个“贼忒嘻嘻”的欧阳克。那时，黄蓉思量郭靖已经死在海上了，自己也不再存生还之想，只是师父还重伤在身，需要自己，所以只好打起精神来寻住处、烤野兔，并与欧阳克周旋。这个从不知忧愁为何物的黄蓉，一个忍不住便掉下泪来。没有了郭靖，黄蓉就没了主心骨，生活也失去了意义。第三十九回，写郭靖从蒙古回归宋朝，一路上为母亲、黄蓉和洪七公的死而感到难过，对自己一直为之奋斗、奔波的“报仇”，对自己心目中一直视为“英雄”的成吉思汗所苦心经营的“大业”，都产生了怀疑，在孤单寂寞中百无聊赖，不知道生之意义

何在。直到黄蓉的突然出现，才重新支撑起郭靖的生活和信念。对于郭靖来说，黄蓉是他生命的活力和快乐的源泉，没有黄蓉，郭靖也没了主心骨，生活也显得没有了意义。这一对天造地设、至情至性人物的搭配，看起来似乎只是具体艺术技巧上的安排，其实更体现了作者对于生命的一种理想境界的追寻和赞美。

在不同性格的不同搭配中显示其各自不同的性格侧面，也是作者惯常所用的手法。比如洪七公与黄药师这一对同是有着一言九鼎性格，并以武林宗师的身份自重的人在同时出现时，机智、宽厚、滑稽，与睿智、褊狭、冷漠便形成极大的反差。而在洪七公与欧阳锋同时出现时，同是执著、刚强的性格中，又有着善良与刻毒之分，利人与利己之别。当黄药师与欧阳锋同时出现时，他们虽然都有行事邪僻的特点，却又有光明磊落与阴险诡谲的对比。这三个人形成的三组性格，虽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但也应当承认，他们也都是至情至性的性情中人：黄老邪我行我素，蔑视礼法和礼法士，不受世俗成法的拘束，何其自在！老毒物真心一念系之于“武功天下第一”，摒弃了人间的一切欲念和顾忌，何其真诚！老叫化大难将死时，并无其他挂念，只是一心想吃皇宫御厨做的“鸳鸯五珍脍”，真率之情，也是世间少有。东邪独处桃花岛，西毒远离中土，住在西域绝境，而北丐是全国叫化子的首领，这是作者对他们性格中最主要的区别——偏执孤僻和心胸开阔所产生的一种解释。其他如对郭靖与杨康、杨康与穆念慈、穆念慈与黄蓉、黄蓉与华筝、欧阳锋与欧阳克、欧阳克与杨康、欧阳克与黄蓉的刻绘描画，都属于这一类。除了那个在书中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无所不能又毫无所能的，呈现出理念化色彩的周伯通之外，几乎书中刻画的不同性格都很成功。作者即使对不那么重要的人物，也从不马虎从事：性格各异的江南七怪，成吉思汗和他的四个儿子，笃厚内敛的郭啸天和暴躁外向的杨铁心，刚烈的李萍和温柔的包惜弱，急于事功的丘处机和心胸

冲淡的马钰，乃至粗鄙愚钝的完颜洪熙和工于心计的完颜洪烈兄弟，都是在相互对照的描写中相映成辉。

看完《射雕英雄传》，你会觉得连最次要的人物，也都有属于他的、有相当根据的个性。作者是那么用心地、充满情感地结构他们的人格。他把属于他那个年龄的是非分明、善恶清晰的心态，都编进了《射雕英雄传》，同时把他的社会理想、他的侠客之梦，也编进了《射雕英雄传》。台湾学者曾昭旭所言其实不假：

在金庸的作品中，就我看过的而言，我还是最推崇《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就因为这两部书中所塑造的人物，不但一个个都形象突出，而且整体看来，也最能形成一个完备的系统，而足以勾勒出金庸笔下性情世界的基本风貌。

——《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

金庸从初出山门时的《书剑恩仇录》重在写故事，发展到《射雕英雄传》重在写“人”——写不同人的个性；写“情”——写情义、人情、感情。他研究过西洋戏剧研究者对戏剧、小说的三十六种变型的分析，也在第二十四回牛家村“密室疗伤”中有过与戏剧舞台场面和人物调度相类似的尝试。在三十四、三十五回写江南五怪死于桃花岛的疑案，采取过侦察、判断、推理的西方侦探小说的写法……既很传统，也很现代。传统的道德“是中国大众所普遍同意的”（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现代的构想是“经刘绍铭兄提出，我自己才觉察到，写作之时却完全不是有意的”（《射雕英雄传·后记》），金庸说得很平淡，并不想耸人听闻。

三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的小说来说，“武功”描写是具有特别意味的部分，由于它与今天的生活难以拉近的距离，和它在小说叙述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具有一种神话色彩和魔力。每一个武侠小说家实际上都要自创一套自己的武功体系，能不能让这套体系深入人心、引人入胜，就要看小说家的本事了。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创造的武功，便有着既可感又玄妙的特点，“可感”在于武功与人物一样，也具有了性格化的特点，而“玄妙”在于那些武功的古雅诗意的名目，让人浮想联翩。

王真人的“一阳指”，会使你肃然起敬，它给人一种与从未出场的“武功天下第一”的中神通一样神秘和正气凛然的感觉。周伯通的“双手互搏”自家打架，会让人觉得既滑稽可笑，又匪夷所思，正好与老顽童聪明、顽皮的性格相呼应。东邪的无敌玉箫的玄虚、西毒的霸气铁笋的阴狠、南帝“先天功”的空灵、北丐“伏虎拳”的刚烈，都是这些武功主人的气质、性格的绝妙补充，更不用说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摧心掌”，老毒物的“灵蛇拳”、“蛤蟆功”和瑛姑的“泥鳅功”了。

以郭靖的广博深湛和黄蓉的灵慧刁钻，他们的武功也显示了主人公的气质和容量。郭靖的武功全属阳刚一路，他接受了江南六怪的兵器、全真派的内功、北丐的“降龙十八掌”、周伯通的“空明拳”，并从全真七子的天罡北斗阵法、南帝为黄蓉治伤的点穴指法、黄药师的玉箫声中，使自己的武功在转益多师之后，达到了融会贯通。他的武功进益，正与他非同一般的正大沉雄的性格特征相为表里。黄蓉从黄药师那儿接受了祖传“兰花拂穴手”、“落英神剑掌”，又从洪七公那儿学得了“逍遥拳”和“打狗棒法”，即使单从这些武功的名目上，也可以令读者领会到，这些

武功正是对轻盈、灵动、优美、自如的黄蓉喜欢揶揄的外表和内心特质的补充。更不用说像“最后她与洪七公同时发招，两人并肩而立，一个左起，一个右始，回旋往复，真似一只玉燕，一只大鹰翩翩飞舞一般。三十六招使完，两人同时落地，相视而笑”这样的形象描写了。

《射雕英雄传》对于武功招式的命名，还有玄妙、儒雅の意味，单是郭靖向洪七公学习的“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飞龙在天”、“龙战于野”、“神龙摆尾”等名称，就够你琢磨一阵子了，文化高的人自会去查《易经》，揣摩八卦与掌法之间究竟有什么相通之处，普通的读者也会因其古奥而生出一种肃然起敬之心。

香港的倪匡曾经说金庸小说“上至大学教授、内阁部长，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爱看，可说是真正的雅俗共赏……小说能写到雅俗共赏，是最不容易的事了……正所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要热闹与门道兼具，是最难的了”。（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可见武侠小说虽然是“通俗文学”，但要写得好，也颇不容易，这般兵器也不是人人都要得好的。相比之下武侠小说要写得“热闹”，比起要有“门道”来，还是容易些，而如金庸那样，能使武侠小说中包含着如许的文化意蕴，当然也就更不容易了。

《射雕英雄传》中的“降龙十八掌”诸招式名目出于《易经》，周伯通“空明拳”的拳理出于老子《道德经》，丘处机所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说法，源自《公羊传》，黄蓉与南帝手下的书生以《诗经》中的诗句互嘲……最使郭靖刻骨铭心的文章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岳飞的《五岳祠盟记》，黄蓉嘲笑欧阳克书法拙劣，是“朝奉”所写，是因为苏浙皖一带称当铺里的管事为“朝奉”，并非指的宋代六品文散官“朝奉郎”，“天罡北斗阵”名目涉及天文学，黄蓉给瑛姑出的三道题，取自中国古代的《算经》，“斡难河”是成吉思汗开始发达

的地方,襄阳是南宋所恃长江天险的咽喉要塞,蒙古军先取襄阳自有兵法上的道理,全真七子用以联络、使用的“飞流星”,是宋代火药应用技术之一,黄蓉的“好逑汤”取自《诗经》首篇……其他如书中所涉竹哨驯蛇的知识、汗血马的特点和来历、孙子兵法的战阵、宋代“明教”的渊源、“丐帮”的组织系统,以及宋词、金词、元曲和宋元间方言俗语的大量使用,都显示出作者在典章、文物、制度、天文、地理、诗词、绘画等等方面的文化修养。这些丰富的文化内容的融入,顺手拈来的文化掌故,使金庸那本来已经很“热闹”的小说中的文化视野得到扩充,“门道”也就多起来了。曾昭旭说:“在现代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无疑地具有宗师的身份。他不但是现代武侠小说新形貌的塑造者——金庸以后的武侠小说作家,恐怕没有不受他影响的——尤其可贵而难为其他作家企及的,是他以其广博的史地与古典文学知识,以及对人性的深刻了解,能毫不费力地写出内容真实而丰润,意境深沉而切理的作品,使他的武侠小说能在消遣之外,别有系人心处,而具有充分的文学价值。”(曾昭旭《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应说当并非过誉之辞。

我第一次接触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在十一年前的一九八六年,当时,我的女儿在北大附中念初二。我从学校得知女儿在六门课的课上“看金庸”,导致六门课的分数直线下降。为了教育女儿,我开始读《鹿鼎记》和《天龙八部》,《鹿鼎记》读得比较细,《天龙八部》读得比较粗。读的结果是,我未能如当初所想,与女儿做一次有否定倾向的谈话,似乎问题没那么简单,勉强那样做了,也未必公正和有益。

此次我应文化艺术出版社之邀评点《射雕英雄传》,出发点与目的自与十一年前又不一样。反复几遍看下来,重又觉得这“评点”的活也“没那么简单”。我希望我能够批评得“公正”,也希望我的阐发能对读者“有益”。

目 录

《射雕英雄传》总论·····	玄书仪 (1)
第一回 风雪惊变·····	(3)
第二回 江南七怪·····	(55)
第三回 大漠风沙·····	(105)
第四回 黑风双煞·····	(149)
第五回 弯弓射雕·····	(195)
第六回 崖顶疑阵·····	(237)
第七回 比武招亲·····	(289)
第八回 各显神通·····	(339)
第九回 铁枪破犁·····	(370)
第十回 冤家聚头·····	(417)